

# 全球化的本土化与文化遗产

——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

[美] 安乐哲

汪泓译

## 一、全球化的两种模式

除了最近开展的少数短暂的争论和各自取得的日益显得毫无意义的胜利外,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论辩已经陷入一个十分空洞的境地。西方(盎格鲁——欧洲的)哲学在当下的旺盛生命力,并不是反现代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取得的对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提倡者的论辩性胜利,而应归功于对话空间的转化。在这样的对话空间里,活生生的思想参与得以发生。这种转化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一个结果。全球化这个术语一直呈现出两种有争议的涵义。主导性涵义是这样的: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对理性和道德观念的普遍认同。全球化则与这种观念的传播息息相关。从现实的层面看,全球化又与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理性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同义词——现代化本身则被认为与西方化同义。

在全球化的这一主导性含义的语境下讨论后现代主义,既能澄清这个概念,又能使这个概念的意义相对化。后现代是一个独特的西方事件。如果从现代性这个词本身最有效的涵义来看,而不是从其他原因考虑,现代性是西方的独创。<sup>①</sup>那么,被理解为西化的全球化,当然就显然是一种现代的动态。所谓后现代思想

<sup>①</sup> 对于现代性是西方的发明这一主张,进一步的讨论参见郝大维(David Hall):《罗蒂:新实用主义的先知与诗人》(*Richard Rorty: Prophet and Poet of the New Pragmatism*, Albany: SUNY Press, 1997),29—47页;以及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Press, 1999),63—97页。